

DOI: 10.13484/j.cnki.ndxbzsb.20200111

女子职业教育的发端: 近代女工传习所社会价值探析

冀震宇,白中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 在清末民国初这一历史时期,受西方职业教育观念和国内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各地女学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作为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发端,女工传习所很快成为众多女学类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的创办不仅提高了女性的生产和生存技能,亦破解了部分女性在就业和生计上存在的困境。女性通过附属文化课的学习,提高了自身的文化认知水平。同时,它的创办不仅为近代女子职业教育树立了典范,而且在转变女性社会和家庭角色及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上均引发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尽管该时期的女工传习所还有很多缺陷,但它的出现和推广却直接推动了近代女性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 清末民国初;女工传习所;刺绣;蚕桑教育

分类号: K25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20)01-0076-08

“女工传习所”^①是女子学习简单文化、技艺的重要场所,是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萌芽。它出现于20世纪初,且多为民间实业家自行筹资开办,其中以1904年上海士绅姚义门所创办的上海女工师范传习所,及张謇创办、沈寿主持的南通女子刺绣传习所最具代表性。而后,官办女工传习所也应运而生,大多是晚清政府为解决旗人妇女的生计问题和改善旗人慵懒的生活习气而开办,但后因经费短缺、管理混乱等诸多现实原因而迅速归于失败,如1909年清政府创办的“奉天八旗女子工艺传习所”“锦州八旗女子工艺传习所”等传习机构。因此,早期官方开办的女工传习所无论是在发展特点上,抑或是运作模式上均不具有代表性。但无论是民办或官办,女工传习所的创办宗旨都主要以使女子精工艺、能自立为最终目的,课程设置有普通科目和技艺科目两科,所传授的技艺有刺绣、机织、手工、编织等。关于近代女工传习所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空白区域,研究成果较薄弱^②,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

研究成果更是鲜有出现。有鉴于此,笔者经过长期搜集、考证相关材料,并在系统梳理史料的基础上,以该时期女工传习所创办引发的社会效应为线索,对该时期女性的职业教育状况及女性家庭、社会角色的转变进行必要的探析,以期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一、女工传习所引发的社会效应

近代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导致人们固守的传统伦理观念渐渐得到了改变,特别是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女性在生活的诸多方面获得了解放。这一时期,大量的女性像男性一样不断涌向城市,出现了妇女走向社会做工之风。加之近代西方职业教育理念的广泛传播,及该时期实业救国思潮的驱动,女工传习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就种类而言,女工传习所可分为刺绣传习所、蚕桑传习所、编制传习所等诸多类别。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18BZZ049)

收稿日期: 2019-03-12

作者简介: 冀震宇,男,河南邓州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白中阳,男,河南鹿邑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为重要的是,该时期以“大爆炸”态势涌现出的女工传习所引发了极大的社会效应,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 解决了部分妇女的就业和生存困境

近代的百年时间里,中国妇女群体的就业窘境是一个不争的客观现实,特别是在近代这样一个灾荒、疾病频发,战乱频仍的纷乱年代里,生存问题更为突出。随着民众生活艰难程度的与日俱增,困扰民众生存的各类因素也呈现出日益复杂的态势。因此,基于民众的生存压力和国家政局相对稳定的现实条件,政府必须要做出自身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以创办和支持女工传习所来化解纷繁复杂的各类社会矛盾。所以,该时期女工传习所的大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妇女的就业和生存困境,亦缓释了政府的一部分执政压力。正如很多女工传习所在招生简章中常附的“所有毕业生将来即于本所附设工厂,令充工匠”^[1]宣传,《大公报》亦对开办女工传习所的原因做了如是报道:“职业教育之有裨于生计,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我国鉴于近来人民生计之缺乏,提倡不遗余力筹办。”^[2]在学员学成后,又出现了学员依托传习所、凭借所学技能而盈利的报道。以上海北马路家庭女子传习所为例,其毕业学生制成的许多工艺品被寄至美国探寻销路,一旦畅销,立即扩大招生并加大产品生产力度,进而以求盈利。^[3]所以,很多女工传习所从解决妇女生计问题的角度考虑,在探寻到销售渠道后,开始扩招生源,如“北马路家庭女子传习所,以前招花边、发网两科学生,原定额四十名,业已来所修业,现该所为提倡普及女子工艺起见,拟续招插班生三十人,不收学费,并备午餐一次,望有志向学者幸勿观望自误”^[4]。又如“天津女子家庭工艺传习所,所长孙少文,现以扩充科目,拟定添招抽丝、缝纫、刺绣三科学生数十名”^[5]。足见,很多女子传习所在创办之初就是以解决女性生计问题为主要现实因素考量的,也自然在创办成功后要率先解决学员的生存压力问题,且卓有成效。

以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南通女子刺绣传习所”为例,该传习所因有刺绣大师沈寿在此任教,更在张、沈二人的悉心管理下,使得很多学员产出的工艺品能够多次参与国际工艺品展览,并能在国内外打开广阔的销售市场,这就直接解决了部

分学员的生存困境。^[6]另外,随着“沈绣”流派的极大发展和传播,它开始成为当时中国众多刺绣流派中的典型代表,并且在这种刺绣“品牌文化”效应的刺激下,学员们因为学习了“沈绣”而更容易就业。所以,在就业方向上,“其毕业生徒,或往内地传习,或留本所为师范生”^[7]。“沈绣”学员在具体就业上亦大放异彩,如“首届刺绣研究班优秀毕业生宋金苓,接任第三任女工传习所所长,后任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第三届刺绣研究班优秀学员巫玉,先在六合任教,后亦任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第五届优秀学员李巽仪先后在南通工艺美术学校、手工业学校、工艺美术技工学校和各种刺绣培训班任教。第十四届研究班学员庄锦云曾在张吴女工传习所任教,学员周禹武曾在安徽、山东及南通女师任教”^[8]。

另外,吉林地区的女工传习所较为特殊。在当时的吉林女工传习所中曾出现了“带薪实习”制度,即毕业前的学员如有意愿在将来寻求更好的工作,可自愿与校方订立合同,毕业前学员须在女工传习所里做一年左右的义工,相当于时下的“实习生”,毕业后即可被安排在传习所的附属工厂里工作,特别是一些心灵手巧、工作能力强的学员,还极有可能获得加薪等奖励。更为独特的是,政府为了大力倡导女工传习所的发展,允许学员在工厂附近设立传习所学生出品代售处,便于厂中所出货品的销售,并给予免税,以资扶持。^[9]如此一来,学员们通过对自己所学传统工艺的一线实践,拥有了用来养家糊口的一技之长。学成后的学员,有的开办了家庭式的手工艺品作坊,自己生产工艺品自己销售,而更多的则是由女工传习所推荐到别处任工艺教员或直接升任本所教员,因此学员们在就业方面还是比较乐观的。关于这一点,《申报》和《大公报》对女工传习所曾进行过频繁报道和关注。表1是笔者根据这两大报章中关于各类女工传习所在经费募集、招生宣传、日常管理、就业安置等方面的报道进行相关统计,统计时间主要集中在1905年至1928年,即清末民初这一女工传习所发展的黄金时期。通过该表能清晰地发现该时期女工传习所蓬勃发展的态势及社会舆论对该类女子职业教育机构的重视。

表1 清末民初媒体报道的女工传习所次数统计

报章类别	《大公报》 《申报》	
	《大公报》	《申报》
刺绣传习所	30条	45条
缝纫传习所	25条	50条
蚕桑传习所	78条	38条
保姆传习所	12条	68条
速成传习所	29条	55条
手工传习所	33条	62条
美术传习所	21条	69条
其他类型	32条	41条

资料来源:1905年至1928年期间的《大公报》《申报》。

综上所述,在女工传习所学成之后的广大妇女,凭借自己在传习所学到的技能,有的回家通过织布、养蚕、刺绣、编织等补贴家用来解决生计问题,有的则直接被村里、县城抑或是大都市聘为传习所或女校教习,将自己所学的生活技艺再传授给其他妇女。这样不仅让她们实现了就业,而且开始逐步摆脱男性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实现了自己人格上和经济上的自立、自主。尽管毕业后的妇女们大多从事和职业教育相关的工作,但不可否认,传习所的很多优秀学员结业后在就业上还是比较理想的,特别是后来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很多原来传习所的女技工开始纷纷涌入近代化的工厂做工或担当技术指导,足见其就业形势还是令人满意的。且长久以来,女工传习所的妇女们薪火相传,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妇女自身的解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 提高了妇女的文化认知水平

传统中国社会中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有限,这是制约女性获得身心解放的重要原因。但必须强调的是,近代的广大妇女不仅能够在女工传习所中学习到编制、刺绣、印染、纺织等传统手工技艺,而且该时期的女工传习所还会教授她们大量的文化课知识,以此来辅助女工们更好地掌握传统工艺的操作要领。例如,“越郡前自裘君创设女工传习所后风气大开,近由金君于临浦镇仿照开办,计分国文、算学、机工、手工等科,令以六个月毕业,七月十八日为开课之期,贫家女子欲习女工者可先期赴所报名”^[10]。再如,“扬郡第一女工传习所去岁成立,今春复改良教育注重工艺,现拟扩充学额续行招生,不限额数并附设养慧幼女学堂英文专科,暂设学额二十名,待经费充足再行扩

张”^[11]。又如,“爱国会创设女子工艺传习所不逾数月成效昭著……现设有图画、算术、国文、家政,其速成科目在四大部任择一门卒业,计三学期,速成科三个月卒业,后呈报教育工商总长颁给证书”^[12]。足见女工传习所对文化课的重视程度。

通常在女工传习所内部均设有学习部和出品部,且两大部门的具体教学分工有着显著不同,“学习部教授各科刺绣、图画、国文、英文、算术、书法、手工裁缝草帽。出品部每星期以三时习国文,三时习图画为补助,余时专制绣品”^[13]。如此将文化课和技能课配合学习的培养方式在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史可谓首开先例。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很多女工传习所中开设的文化课还有“必修”和“选修”之分,如,“艺课为中外女红……学课教授以国文修身,以家政、算学为必修课,图画、乐歌为随意课,正科生均需全习,速成科生酌定数门教授”^[14]。

另外,在学员文化课教材的选择上,考虑到学员的文化认知程度和接受能力,女工传习所倾向于选用易懂、易学的通俗类教科书。如,“教科书用白话文言对照,上编以白话为经,文言为纬,下编以文言为经,白话为纬,并附教授法,按法教授。习六个月,可看白话书报,习一年可写浅近信札,以专饷我过渡时代之女子”^[15]。采取如此“文白相间”的通俗教材,不仅提高了学员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而且拓展了学员们文化知识的学习,提升了她们的工艺课学习效果。

足见,众多女工传习所均加大了对学员文化课的重视程度。事实上,只有妇女学好文化知识,才能更加便捷、系统、准确地学好传统工艺的操作技能,毕竟很多传统技艺,如裁剪、刺绣等工艺,是需要算数、绘画等文化课作为辅助和理论支撑的。同时,让妇女学习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能使她们在毕业后借助文化课的有利条件,更好地将所学的工艺技术以理论化的方式传授给其他妇女。如前文所述,很多妇女在传习所学成后大多选择在乡村、县城或专门的女子工艺学校充任教习,正因为她们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系统地梳理、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如,南通女子刺绣传习所第五届优秀学员李巽仪不仅能任教,还撰写了《南通刺绣针法》。^[8]

(三) 奠定了女子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

近代女工传习所的创办风潮,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看做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滥觞。无论是在入学妇女的选拔上,还是在女工传习所开设的课程设置上,抑或是在女工传习所自身的管理上,都为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下女子职业教育的改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借鉴。

首先,女工传习所在学员的选拔上均有各自的标准。清末开办的女工传习所在学员的旗人身份上就有“专收贫苦无业旗人妇女”^[16]的明确规定。另外,对于釐妇和贫困女子优先录取,如,“松郡全节堂附设之松筠女校,业经臧太守飭改为女工传习所等情……先尽釐妇,附收贫家女子……定额四十名”^[17]。传习所严禁身份不明或有不良嗜好的学员入学,要求学员“身家清白……无疾病嗜好者,得入学习部”^[13]。在入学年龄上也有一定的限制,如,“北马路家庭女子传习所,现拟添十五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不收学费,一年毕业……”^[18]在能力上又要求学员有一定的学习基础,如“能作旧式刺绣、针法敏速、出件鲜明者,年满十八岁以上,得切实之保证一人,可入出品部”^[13]。更有个别传习所鉴于所学内容,对学员有学历上的严格要求,要求学员为“高等女小学之学生或高等女小学以上之学生,或者在私塾读书与高等小学相等者”^[19]当然,此为极少个例,在此不赘述。

另外,为了保证生源质量,很多女工传习所在学员入学时还有相应的入学考试,如,“先由四县茧业公所各保送高级小学或有相当程度之女生,经本试及格,每县录取二十名合成八十名”^[20]。又如,南通女子刺绣传习所对学员的录用也有严格的规定“学员入学不仅受年龄的限制,而是要通过考核,考核的是学习能力以及是否有刺绣天赋。”^[21]这些选拔方式均是女子职业教育兴起过程中的首创,不仅保证了女工传习所的生源质量,而且也为了后来女工传习所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的实施上打下了一定基础。

由此可知,该时期的女工传习所对学员招收均有相应的年龄、身份、能力和入学考试等诸多方面的要求。在年龄上,学员大多在十四五岁以上,且具备学习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在身份上,官办传习所早期以旗人妇女为主要招收对象,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大量旗人妇女赋闲在家、无所事事的不良状况,让旗人女子也有事可做,降低政府对旗人的财政开支,并借此改良乡村慵懒的社会风

气。因传习所的推广,后来所招收的妇女则放开了旗人这一身份的限制,主要招收苦无生计的贫困妇女,这样就扩大了女工传习所的生源,从而为女工传习所创办风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女工传习所在开设的课程上注重实践和理论相结合。该时期的女工传习所除开设刺绣、编制、蚕桑等具体实践课程外,还大量开设了诸如国文、算数、英语、歌乐、体操等现代职业学校通用的文化课程。女工传习所的学制制定和课程设置既结合实际,又较为规范,尤其着重在教学中逐渐完善传统工艺的教育体制,突破原有传统手工艺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单纯形式,采用多层次的教學方法,开创了职业教育中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的先例。正如前文提到的,很多优秀学员毕业前是可以留在传习所或者传习所开办的附属工厂进行“带薪实习”的。这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对近代女子职业教育具有开创性的示范意义。

最后,女工传习所在日常管理上也是极为严格的。近代女工传习所创办的初衷,除解决妇女生计和就业问题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净化女性慵懒的社会风气,使广大妇女能够自律、自爱、自强、自立。因而该时期创办的很多女工传习所在管理上执行严守生活作风的标准,让入学妇女在入学前和学成后都能保留最初的纯朴和善良的本性,正如监管女工传习所的政府官员在学员毕业典礼上道出的初衷“你们来省城学习蚕桑事业故是好处,但一定也更要远离一些坏处,因为省城的习气不仅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也好,你们在省城住三年住半年一定会学的奢侈起来,最怕的是你们会将省城的这些奢侈风气带回家去,惹的翁婆讨厌……你们可将学到的技艺带回去,其余的一概不许带回去。”^[22]

基于以上原因的考量,政府和女工传习所机构的创办者对学员在校学习期间的管理和考核都加大了管控力度。例如,学员入所时需出具志愿书并邀保证人缮具保证书,若因故出所,需由保证人陈明所长及驻办,得其许可方能出所。“凡学生无故半途出所者须向保证人追缴学膳费,凡学生不守本所规则或有不正当之计,为查明确实者得由所长报告监督,指令出所并追缴半费”^[9]。再者,以清末的奉天八旗女工传习所为例,起初在传习所的监督之下仅设立司事,协助筹办日常学

员的监管,后根据实际需要陆续添设了男女管理员各一名及学堂管理等职务。在具体日常管理上,以女性穿着打扮为例,“凡来学者,不限年岁,惟服饰概尚朴素,并不得涂粉抹脂缠足。其有已缠足者,能放最妙,如或不能,亦须着无花圆头鞋”^[15]。另外,八旗女工传习所在开办初期因经费有限,无法为学员提供膳食,学员都是采取走读的形式学习,朝集晚散,学习和生活极为不便。后来办学资金充裕,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才开始增设午餐。更值得强调的是,传习所在分科教授和监督学员们从事手工艺品生产的同时,对她们的学业实行定期分考,把考试成绩同学员们平日做工时的勤惰表现合计在一起进行平均核算,最终分等级发放凭照,表现好的还会发给奖牌以资鼓励。^[23]

如此严格的教学管理和日常生活管理,为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管理开辟了全新模式,更为当下女子职业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是这种严格的管理、考核制度,才使得学员们的产品有幸参加世界工艺展览会,让更多的中国工艺品走向世界,如“各省女工传习所之绣货:女围屏、桌摊、披肩、琴罩、帐颜(西国无蚊床皆无帐,但可充客厅陈设)、天足西式淡雅绣鞋面(到后饬西匠配成可充富贵妇女跳舞之用)、江苏如皋贴绒物件等”^[24]。这些工艺品均受到西方人的认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大量女工传习所的开办,不仅是教育管理模式的发展和创新,亦打开了中国工艺品的知名度。

(四) 冲击了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

女工传习所出现之前,舆论普遍认为女性只不过是“寄生”在男性身上的“附属物”,但是随着女工传习所创办高潮的到来,针对多数妇女处于无业状态的现实,致使社会上对女性“寄生”于男性的现象引起了极大非议,如当时的论者就曾指出“我国筹办职业教育之第一缺点在仅及于男子而不及于女子,以至于女子终日荒嬉,一切生活均仰给于男子,而为分立之人。”^[2]然而,当妇女离乡入城参加传习所的学习以后,客观上使她们脱却了自己所依附的家庭和男人这些固有的纽带,她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去学习谋生技能,表明了女性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而自食其力,并不必依托于男性而谋求生存空间。这是在近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妇女生产生活方式的一

种根本性转变。这样的转变使得那些排斥女权的传统人士开始以新的眼光重新定位女性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将来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反思传统伦理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这种“程式化”的社会分工模式对女性的束缚影响,因而很多人站出来伸张女权,提出女子与男子应并立并用的新观念。当时《申报》上所报道的“越郡女工传习所”就以造就女子自立之资格而维持利权为宗旨,修改招生章程,本着女子自强不息的观念来招生办学。^[25]足见,开办女子传习所的最初目标之中就有使女性自立、自强和摆脱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束缚的因素。更有论者就传统道德观念下对妇女的性别歧视,以及性别上的家庭分工对女性的压迫而鸣不平,论者认为“今日为女子者,且自叹人生之不幸,事事退让,不敢与男子并立,以为男子治外,女子治内,酒食是议,阃阈不出,暇则治女红,勤洒扫,如是不愧为妇人,若留心世务,娱志诗书,即为越分。”^[26]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女性被“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伦理所束缚,才使得妇女们的应有才智和能力受到这种旧有伦理观念的抑制。所以,女工传习所的大量创办顺应了广大妇女寻求身心解放的呼声。

随着女工传习所的创办,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她们开始独立谋求属于自己的生活,期盼能够获得像男子一样的社会价值认同。为此,妇女们为寻求独立、自由、平等进行着有力的抗争。清末的上海女工传习所妇女就曾为此发起过抵制美货的运动,如,“二十五日午后一时,城内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假商学会开女子大会,筹议不用美货之办法,到会约百余人。先由该所学生陈闰秀女士宣布开会大意,继由曾泽新、王伟杰、苏祖润、姚明珮、田思平、曾千里诸女士演说。或述美国虐待华人之非理,或谓急宜将女子所用美货自行制造为中国兴工艺,即所以实行抵制,或谓女子能实行抵制乃见吾国人心一致。演说既毕,陈女士提出该所校长姚君所拟定之办法五条:一、所有美货自今日起请各自承认勿买,并请运动亲戚、邻舍亦勿购买。二、凡有美货逐一收买齐全,陈列于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任人观览,俾使识认。三、举国纷纷抵制美货牌号,因此更改、冒充英国货物者业已不少,须由速成女工传习所调查清楚刊发传单咨照大众,以免误买。四、美货可以仿造者即如各式洋线领头、洋线云肩、各色洋

线花边、洋线衣服、绒线类帽子、鞋袜,又机器织各式斜纹洋布等件皆可自制,廉价出售务期实行抵制。五、拟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于暑假后添设一特别科,仿造女子所用之美货。以上五条全会一同赞成遂散会”^[27]。从这场抵制美货的运动中我们不难发现,女工传习所的女性学员们为获得像男子一样的价值认同,精心准备、周密计划,积极参与抵制美货的运动,足见女性对获得社会价值认同及女性社会权利的渴望。

论者还通过中外女子职业教育及妇女社会地位的对比来倡导兴女学、伸女权,强调富民强国的迫切性,指出“英美各国妇女,操工程测量乐律诸事者,多至数十万人。比利时于敖斯得唐地方,开博览女工大会,合全球女子工业,罗列比较,进步改良。吾国女工拘于纺织针黹获利纤微卑无足道。坐令二百余兆人之精力销磨于无用之地。尚能效法欧美使女子不为分利之人,富国裕民,可跂足待,裨益非浅鲜也。”^[28]

伴随着女工传习所的创办而引发的兴办女学的议论也日益增多。人们日益效仿欧美女子职业教育成功的范例,并逐步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偏见,主张女子和男子均享有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权利,并发挥同样的社会功用。论者还认为,如此不仅能够减轻普通中国家庭的负担,亦能够以伸张女权为路径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由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判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身心束缚,认为,“若徒以工刺绣、司酒食为能,则失之远矣”^[29]。如此主张男女平等,并极力支持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发挥女性聪明才智的新观念,是在近代新兴生活方式变动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必然现象,而女工传习所的大量创办,足以证实该观念在当时已经具备一定的生存土壤。

二、女工传习所创办中存在的困境

首先,早期女工传习所混乱的管理体制影响了其自身的发展。女工传习所开办伊始就是以解决女子和其他贫困妇女的生计和就业问题为目的,它的出现是政府和民间重塑城乡经济和教化民风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光绪二十九年(1904)开始至民国结束(1949),女工传习所前后创办的

具体数目和区域分布已无从考证,但从该时期女工传习所的具体管理上不难看出,它的早期创办权主要掌握在晚清封建官僚及民国初年的地方官绅手中。因为其运营和管理方式均是以行政手段进行机械地实施和操作,所以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很多女工传习所经营混乱和管理无序,如此也就严重影响到了女工传习所的正常运转。例如,“会稽之山后清节堂各妇,平日女红贫乏且所获甚微,兹由绅董等议妥,于堂内设立女工传习所,延聘女教习到堂教授,并设外所,定额三十名,由女董监督,以便左近妇女往习藉,以广女工利益”^[30]。这里的“女董”多是资助传习所的绅商家属,她们既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又无高效的管理方法,因此,部分女工传习所内部出现管理混乱的状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女工传习所在经费的管理上也极为混乱,经常出现财务责任划分不明的状况,如,“鄂省认拨荆州驻防旗营女工厂习艺经费,原在满营俸饷减平项下动支,每月银一百两,嗣因度支部以此项银两原解解部,不准拨充经费,又经藩司在司库解部减平,平余项下如数拨给。现杨护院接准部,覆以此项。女工传习所关系旗民生计,该防营无款可筹自应准其在司库减平项下暂行动支,以资提倡至旗饷减平仍应解部以符原案,刻已转行藩司查照交涉矣。”^[31]从中不难看出,湖北荆州驻防营附设之女工传习所的经费管理责任划分极不明朗,这里的“度支部”“藩司解部”明显存在传习所创办经费管理上的责任交叉和重叠,如此漏洞百出的经费管理体制,影响了女工传习所的长久发展。

其次,近代动荡不安的政局和社会环境,致使女工传习所的运营经费和资产来源极度匮乏,很多传习所在开办后难以为继,不仅表现为内部实力的虚弱,在经营能力和规模上也日渐凸显出衰败和紧缩的状况。在日常办学经费上的捉襟见肘,导致很多女工传习所时办时停,因此多数女工传习所也谈不上有明显的收益。如,“越郡绅商以女士传习所及押犯工艺局成立已久,而工艺传习所未便再延故,已于积谷捐款内提拨举办”^[32]。又如,“王大令租大悲禅院为校,舍添聘教员增加目课,颇为美备,兹有劣绅宗某,谓该菴房屋业由该绅备价购买,为开办西安坊小学堂之用,逼令女工传习所迁让,找掣同地痞韩某等多人直入占据,百般滋扰,致动学界公愤联名电禀抚学二宪,复并

禀贵太守核示,兹经县主瞿雪斋大令出为调处,未知作何了结也”^[33]。面对财务、资产困窘的现实状况,很多女工传习所通过社会募捐的方式筹集办学经费,以此来维持女工传习所的正常运转。如,“越郡万安桥女工传习所系由郡绅裘激声别驾捐资创立,已逾三载,迩来投习日多,因之万安桥屋舍几不能容,故就中营桥另赁大厦,于月初迁移,添聘女教员并购办机器等件,以广传习。复增家政学等科,分速成、完全两科,定闰月朔起准新女生报名矣”^[34]。再如,“平江县学绅凌君成义,曾就该县创办启明女校早已成绩昭著,所有各学科本由其德配之教授,近复于县城设立女子工业艺徒传习所,分刺绣、染织、缝裁三大科,定额八十名,三年毕业,惟凌君等自办启明女校以来,所有家产久已悉作开办常年等项经费,此次再设势不能不求助于人,爰于日昨刊刷公启,编发各属捐募款项,闻解囊慨助者已不乏人云”^[35]。还有一些女工传习所通过组织学员参加慈善演出的方式来募集办学经费,如,“薛芳女士等发起贫民女子职业传习所……兹闻薛女士等邀集女界同志编演警世新剧,定阴历十五、十六两日,假座张园日夜开演,收取游资以助所中经费”^[36]。由此足见,近代女工传习所的境遇颇为窘困。

最后,女工传习所的日常生产深受传统的官方手工业腐朽生产方式的影响,所以学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必然受到限制。早期官方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极为滞后,所以,该时期的女工传习所限于当时的现实条件,只能被动地沿用落后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这就在客观上严重地影响了女工们学习、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使得女工传习所正常的教学和运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张謇开办的南通女子刺绣传习所的发展历程即是如此。早期深受传统的官方手工业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后来改善了管理,更新了设备,聘请了沈寿等教学名师,传习所运营不良状况才有所转变。在这种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妇女们的生计和就业困境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并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无业和失业妇女依然在女性群体中占据多数,且就业面也极为狭窄,她们中的大多数仅在村里、县城充当传习所教习,并没有实现更宽泛层面上的就业。因而,随着清政府的灭亡及民国政府的成立,女工传习所也逐渐顺应时代潮流,朝着兴办实业、开辟利源和发展教育的方向转变,这才为后来妇女们在较宽领

域上的就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三、余论

在近代那样一个生活方式急速转变、伦理观念飞速变迁的特殊时代,全国兴起了开办女工传习所的浪潮。类型各异的女工传习所在当时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尤其在缓解妇女就业和生计问题上、提高妇女文化认知水平上,以及在推动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方面作用最为显著。尽管受时代所限,当时的女工传习所在经营管理、经费募集、教学效果等诸多方面上均有不足之处,但从该时期女工传习所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积极意义还是占据主流的。在近代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女性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以她们的本性欲求而接受新的教育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旧的伦理不再适用于新的需求,制约女性的旧伦理观念日渐走向衰败,这当然也是一种必然的时代走向。女工传习所作为近代众多的职业教育机构类型之一,堪称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元素,为那个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女性的身心解放留下了显著的历史“印记”。正如当年张謇对女工传习所的评价“人言自立,当能自谋生活,而不专赖乎人。女子教育如此,即非女子教育亦当如此;职业教育如此,即非职业教育亦当如此。”^[37]时至今日,纵然女工传习所早已消散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但对于它在近代职业教育和女性解放等诸多方面曾发挥的作用,我们不应忽略。

注释:

①“女工传习所”是近代女性学习简单职业技能的场所,是我国女性职业学校创立的开端。自20世纪初以来,女工传习所开始大量出现,以1904年姚义门所创办的上海女工师范传习所和张謇创办、沈寿主持的南通女子刺绣传习所最为驰名。近代的女工传习所一般以使女子精工艺、能自立为宗旨,课程分普通科目和技艺科目两科。所传授的技艺有刺绣、机织、手工、编织等。

②学界对近代女工传习所的研究较少,可参见朱洁颖《试论张謇的刺绣职业教育——以女工传习所为例》,《读与写》2013年第7期,第52-65页;白中阳《清末民初女工传习所探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39-45页。

参考文献:

- [1]浙抚奏办工艺传习所摺[N].申报,1905-06-03.
- [2]纪事:南通之职业教育观[N].大公报,1917-02-04.
- [3]成绩品寄美销售[N].大公报,1916-08-16.
- [4]调查兵籍[N].大公报,1915-11-19.
- [5]女工传习所招生[N].大公报,1917-07-31.
- [6]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7]夏晓虹.女子世界文选[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
- [8]张静秋.南通的女工传习所之创办及沿革[J].档案与建设,2007(3).
- [9]房俐.档案吉林(省档案馆卷下卷)[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
- [10]绍兴[N].申报,1905-08-12.
- [11]女工传习所扩张办法[N].申报,1907-08-19.
- [12]抵制服装工料之漏户[N].申报,1912-07-09.
- [13]美术刺绣传习所改良刺绣说无锡华琪识[N].申报,1913-02-10.
- [14]各省新闻:女工传习所简章[J].北洋官报,1906(1100).
- [15]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奏报设立驻防女工传习所[N].申报,1909-05-05.
- [17]女工传习所之改办[N].申报,1909-03-05.
- [18]严守中立[N].大公报,1914-09-26.
- [19]天津私立女子音乐传习所招生广告[N].大公报,1915-01-10.
- [20]苏四县茧业公所开办蚕桑传习所[N].申报,1916-06-06.
- [21]朱洁颖.试论张謇的刺绣职业教育——以女工传习所为例[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3(7).
- [22]讲演:督军兼省长在军署大自省堂为农桑总局附设女子蚕桑传习所高等科第二班暨速成科毕业各女生训话[J].来复,1914(185).
- [23]金毓黻.奉天通志:第50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
- [24]续中国至义国赛会办法[N].大公报,1910-09-05.
- [25]改良女工速成传习所绍兴[N].申报,1905-09-27.
- [26]扶阳抑阴辩[N].申报,1878-07-15.
- [27]不用美货之女子大会[N].申报,1905-07-28.
- [28]论女学宜注重德育来稿代论续初六日稿[N].申报,1906-05-01.
- [29]棣华书屋论女学[N].申报,1876-03-30.
- [30]创设节妇工艺所[N].申报,1906-04-24.
- [31]部咨准拨旗营女工经费[N].申报,1910-01-23.
- [32]提拨公款振兴实业[N].申报,1907-01-09.
- [33]强占传习所屋舍[N].申报,1907-04-02.
- [34]扩充女工传习[N].申报,1906-05-26.
- [35]平江开办女子工艺传习所[N].申报,1911-04-21.
- [36]贫民女子职业传习所演剧筹资[N].申报,1917-05-02.
- [37]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5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马毓】

The Origin of Women'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Value of Women's Training Institutes in Modern Times

JI Zhen-yu ,BAI Zhong-yang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ncept an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trend of domestic industry, the local women's schools mushroomed. As a modern woman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m, female Chuanxisuo soon became a shining pearl for many women to learn to type. It not only improved the women of production and survival skills and also relieved some of the plight of women in jobs and livelihoods. Women also through affiliated academic learning improved their level of cultural cogni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not only gave a brilliant example for the modern women's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changed women's social and family roles and improved women's social statu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efects in the work of female workers in this period, its appearance and promotion directly promoted 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odern women's profession.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men's workplace; embroidery; silkworm education